

## 記憶：地方文革的歷史記錄

——關於《延邊文化大革命·十年約定》——

李慶國

2016年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發動五十週年，也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四十週年。據筆者所知，截止2016年年底，由中國政府出面組織的有關文革的大型紀念集會、學術研討會、文藝活動以及通過多媒體方式進行的各種宣傳活動皆無。官方有意識地且小心翼翼地規避著這一歷史創口，可謂用心良苦。儘管如此，或許由於這一敏感年的緣故，圍繞著文革的各種話題在網絡媒體上明顯增多，甚至出現了左、右思想與輿論的交織與明爭暗鬥。眾所周知，近些年來，「文革」一直屬於敏感話題，也是主流媒體與輿論界進行「冷處理」<sup>1)</sup>的對象之一。特別是在電影和電視劇這一領域，文革題材一直處於比較尷尬的境地。近二十年來與文革題材有關的影視節目可謂少之又少<sup>2)</sup>。導演大多不敢輕易選擇此類題材，因為拍完後不能通過審查就無法正常上映，遭遇禁播的政治性後果和經濟損失可想而知。相比之下，倒是那些鼓吹極端「愛國主義」且無任何風險的「抗日神劇」曾一度氾濫成災<sup>3)</sup>。

然而，伴隨著網絡媒體和公眾號的增加，以博客、微博、QQ、微信和微信群（「朋友圈」）等各種發聲形式不僅加快了信息的傳播速度，也改變了由主流媒體獨控話語權的狀況，網上的「轉發」更使信息的傳播範圍成幾何積數增長。一些關於文革的珍貴圖片、影像資料、史料和回憶錄、採訪錄等也在網絡世界得以傳播。值得一提的，還有一些文革時期的老紅衛兵重返母校向當年曾被批鬥、遭受迫害的老教師及遺屬公開道歉<sup>4)</sup>，儘管也出現了一些質疑和攻擊<sup>5)</sup>，但比起那些至今仍無任何反省、道歉和懺悔之意的沉默大多數來說，顯然是值得肯定的行為，因為它代表了良知的覺醒和社會的進步，對社會所產生的影響是積極與正面的。與此相反，網上也出現了一些公然為文革「正名」、翻案，甚至鼓吹文革的理論和實踐都是正確的言論。還有一些企、事業單位在

聯歡晚會或在私家餐廳等大唱文革時期所謂「紅歌」、大跳「忠字舞」<sup>6)</sup>的視頻也在網上流傳，儘管不排除其中有惡搞成分，但藉懷舊來為文革「正名」、翻案的新動向則不容忽視。

令人關注的，還有 2016 年 5 月 2 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萬人禮堂舉行了一場打著「中共中央宣傳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教辦公室、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團中央中華未來之星全國組委會、中國歌舞劇院主辦」等官方旗號的、名為《在希望的田野上》的「社會主義經典歌曲」大型交響演唱會<sup>7)</sup>。演唱會上大唱紅歌《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還有文革時期的代表性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同時，在舞台屏幕上打出了有文革時代背景的、將毛澤東比作紅太陽的宣傳畫和政治標語「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這在今天看來簡直有點匪夷所思。這種打著「唱紅歌、弘揚社會主義主旋律」的旗號，暗裡卻在為文革「正名」，特別是主辦方打著半官方、半民間的曖昧色彩和其公然懷念文革并挑戰中央對文革作出的徹底否定的結論<sup>8)</sup>的做法，引起了公眾和輿論界的質疑和批評<sup>9)</sup>。5 月 17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任平」的評論員文章《決不允許「文革」錯誤重演》。同時《環球時報》發表署名「單仁平」的評論員文章《「文革」已被徹底否定》。這兩篇評論文章都強調指出：中共中央 1981 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革」作出徹底否定的權威定性，從那時起，幾代中共領導人都堅定維持了《決議》的結論，黨的所有正式文獻也都未出現過任何異議。徹底否定「文革」不僅是全黨上下的認識，而且應當說是中國社會整體上相當穩定的共識<sup>10)</sup>。這兩篇文章發表後反響很大，網上點擊、轉發和閱讀量急劇攀升，被看作中央高層對文革回潮的表態文章引起了網友與思想、輿論界的廣泛關注。

本文圍繞著應如何「紀念」文革，梳理出這樣一個大背景，是基於如下兩個目的：一、是強調我們對文革的反思和研究還遠遠不夠。對待文革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為其「正名」、翻案的亂象和暗流，一方面說明文革的極左勢力和社會基礎依然存在；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我們對文革缺乏徹底的思想清算，致使文革的一些具有迷惑性和煽動力的理論與主張在民眾中仍有一定的市場。著名作家馮驥才在為《一百個人的十年》所作的再版序言中指出：「從歷史學角度看，文革已經成為上個世紀的『過去』；從文化學角度看，文革依然活著。因為文革是一種特定的文化，它有著深遠的封建文化的背景。而且，它活著——不僅

因為它依靠一種慣性，還因為它有生存土壤。究其根本，是因為我們一直沒有對這塊土壤徹底清除」<sup>11)</sup>。可謂至理名言。二、是從這一背景上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延邊文化大革命·十年約定》一書的價值和意義。就文革史研究來說，史料的蒐集和整理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十分緊迫的。因為文革時期重要的參與者早已退出了歷史舞臺，親歷者也越來越少，就連當年最年輕的紅衛兵都已退休步入老年，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任何有關文革的史料蒐集、發掘、整理、核實，包括口述歷史的訪談和記錄等都帶有搶救史料的性質。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延邊文化大革命·十年約定》是繼李振盛的《紅色新聞兵》(*Red-Color News Soldier*)<sup>12)</sup>之後又一部由文革當年宣傳部門的攝影工作者現場拍攝並保存下來得以問世的珍貴文革歷史影像記錄。它為我們還原文革的歷史現場、再現那一時代的混亂、災難、荒唐、瘋狂、罪孽、傷痕以及文革時期的「日常」和「非日常」，都是獨有的且無可替代的。

## 二

這本名為《延邊文化大革命·十年約定》(原書名為《연변 문화대혁명 10 년의 약속》)的攝影集是由韓國土香出版社於2010年2月正式出版的。編著者是韓國首爾出身的攝影家柳銀珪(류은규 Ryu uggyu 1962-)<sup>13)</sup>。該書原文為韓國·朝鮮語，在日本販賣時附加了日語翻譯的活頁，未署譯者名。

據編著者柳銀珪介紹，該攝影集所收照片均為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間在中國的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延吉縣龍井鎮(現為龍井市)及其周邊城鎮與鄉村拍攝的。攝影作者為黃永麟(황영린 Hwang yongrin 1936-2001)。

關於黃永麟，根據該書序言整理如下：黃永麟生於1936年，是吉林省和龍縣智新鄉德壽村人，朝鮮族。他曾在龍井鎮的一家小學校擔任美術教員，後調到延吉縣文化館工作。他在繪畫、書法和裝潢設計方面頗有才能，並在工作中很快就掌握了攝影技術。他通過攝影來做文化館的宣傳工作。他還曾多次舉辦攝影愛好者學習班和培訓班等，培養了眾多優秀的攝影弟子和人材<sup>14)</sup>。

韓國攝影家柳銀珪自從1993年以來曾多次去中國的東北地區進行考察，並收集了大量有關朝鮮族歷史和風俗的老照片。2000年他在韓國首爾世宗文化會館舉辦了《忘卻了的痕跡II—從照片看朝鮮族百年史》的攝影展，並出版

了相關的照片資料集，其中收有幾張文革時期的照片。而這幾張文革照片就是攝影家黃永麟提供的。既然名為「朝鮮族的百年史」，自然應該包括十年文革。然而，反映文革這十年的照片資料少之又少，搜集起來十分困難。據柳銀珪介紹，這本《延邊文化大革命·十年約定》攝影集中的所有的文革照片均出自黃永麟之手。而這些照片之所以能輾轉到柳銀珪之手，又能得以出版面世，還有一個令人感慨唏噓的小故事。1999年正在東北考察的柳銀珪得知，家住龍井的一個姓黃的先生曾在文革期間拍攝了很多照片，而且至今仍有可能還保存著這部分照片。聽到這一消息後，柳銀珪十分高興，立即趕往龍井去尋找這位黃先生。然而，黃永麟先生對這位不速之客的來訪並不歡迎，不僅沒有給柳銀珪看文革時期的照片，甚至連談話的機會也沒有給他。初次見面的冷遇並沒有打消柳銀珪搜求文革照片的熱情和勸說黃永麟的念頭。柳銀珪第二次訪問黃永麟時，他帶上了除了文革十年這一空白外已基本編輯完成的朝鮮族百年史的影像集初稿。黃永麟思考再三，終於提供了文革那一頁的幾幅照片。使得這部《忘卻了的痕跡II—從照片看朝鮮族百年史》攝影集得以順利出版。那之後，柳銀珪繼續來延邊考察時，一天突然接到黃永麟的電話，說要見他並請他去看自己保存下來的文革照片。柳銀珪聽到這一消息興奮極了。他說自己也是攝影師，知道這些文革照片來之不易，那畢竟是生活在那一歷史時空下的人親自拍攝下來的現場記錄，其價值之珍貴不容置疑！這次見面黃永麟鄭重地把文革時期拍攝的大量照片底片交給了柳銀珪，並叮囑他：「請您不要馬上發表，我死了以後您再公開吧」。柳銀珪答應了黃永麟的約定，大約有一個星期左右，他每天都在燈光下一張一張地確認那些文革照片的底片，激動得幾乎未能成眠。他理解了黃永麟之所以在他的有生之年不願讓這些文革照片公開發表，應是出於某種莫名的恐懼。如果這些照片一旦流出，黃很可能會遭受處罰。如此重要的、珍貴的、甚至與性命攸關的文革照片，黃永麟顯然不願意讓它們在自己死後被當局沒收，或散佚或銷毀，因而，他纔把這些照片托付給了一個雖然來自於異國、但值得信賴並深知其價值的攝影師。

就在柳銀珪收下這些照片底片的兩年後，黃永麟去世了。柳銀珪更加感到這些照片所具有的份量。然而，關於這些照片的整理實非易事。首先，關於延邊文革史這一段的歷史大事記和回憶錄很少，現存的書籍關於地方文革幾乎都無詳細的文字記載。《龍井縣志》和《延吉市志》等記載也都很簡略，可供參考的文獻資料很少。其次，對文革無論是受害者還是加害者大都不願揭開那段

創傷。柳銀珪採訪中問及此事被採訪者大都不願回答。況且，在那樣一個混亂的時代誰能夠說得清誰是受害者誰是加害者呢？僅僅從定格在照片中的人物來說，很多人可能仍健在。發表這些照片，或許會對某些人產生不利的影響；或許那裡面還隱藏著至死也不願讓人知曉的事實。然而，經過柳銀珪的不懈努力，不僅為這些照片加上了儘可能清晰的註釋，同時還補加了《中國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文化大革命年表》。從他接手這些照片底片起，歷經十年終於將這些照片以攝影集的形式付梓出版，同時也實現了他同黃永麟之間的一個口頭之約<sup>15</sup>。

### 三

《延邊文化大革命·十年約定》是文革十年的影像記錄，也是第一本來自少數民族地區的文革影像記錄。這本攝影集中的照片均為原創，是當年延吉縣文化館負責攝影宣傳工作的黃永麟拍攝的。筆者推測，這些照片大多是為縣文化館宣傳欄圖片宣傳而拍攝的，其中有的很可能已在地方報紙或畫報上發表過，但更多的照片可能只展出過但並沒有在媒體上發表過。還有一些照片并非工作所需而拍攝的，例如，混亂的武鬥場面和批鬥現場等照片。從這些照片中讀者可以讀到攝影者黃永麟在鏡頭裡有意識地捕捉和記錄那些歷史瞬間的動感和緊張。這也是筆者在翻閱這本攝影集時深感震撼之處。

該書分為〈混亂·破壞〉、〈延邊文化大革命〉、〈鬥爭·傷痕〉、〈中國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文化大革命年表〉這樣幾部分。其中〈延邊文化大革命〉按年代劃分，依次為1966年、1967年、1968年、1969年、1970-76年，估計1970年至文革結束的1976年照片相對少一些，故放在一起介紹。

首先，筆者介紹一下〈混亂·



圖1 造反派組織在武鬥時用木棍、棉花、汽油、瓶等自製的燃燒瓶。木棍是用來投擲的。引自《延邊文化大革命·十年約定》（以下圖片同），15頁

破壞)這一部分。這部分所選的照片有文革初期的大字報、大標語、武鬥時造反派們製作的簡易燃燒瓶(見圖1)、兩派混戰的場面、將對立派群眾組織的俘虜集中在道路中間看押的場景、釘著釘子的狼牙棒(武鬥中使用的武器之一)、佈滿了尖朝上鐵釘的木板、一派攻佔下對方佔領樓房的武鬥情景(見圖2)、武鬥中造反派佔據的樓房和房頂搭建的防禦工事、由解放牌卡車



圖2 龍井鎮街市上的武鬥場景，其中一派已經攻克、佔領了對方占據的大樓。1967年7-8月間。17頁

改裝的宣傳車、群眾圍觀武鬥用的土製道具、武鬥後遭受洗劫的鄉村、被燒毀的房屋廢墟、被搗毀的車間、武鬥現場用來搶救傷員的擔架、被武鬥攻佔下的樓房內部景象等多幅照片(有被毀壞的小提琴、雜亂的被毀壞的體育用品、廣播器材、罐頭、破舊的自行車和衣物等)。這部分照片大都反映的是文革最混亂期(1967年至1968年)由奪權而引發的群眾組織之間的武鬥情景。

「武鬥」，基本上可以看作特定的文革用語，是指文革時期發生的、由全面奪權、打倒「走資派」和摧毀原有的各級組織與領導的過程中，不同的群眾組織之間因觀點不同發生摩擦甚至對立，由最初的口頭辯論逐漸升級為群毆，再由群毆升級為大規模的武裝內戰。毛澤東在1966年8月18日首次接見紅衛兵時，對紅衛兵代表宋彬彬說的一句調侃「要武嗎」<sup>16)</sup>，對紅衛兵「破四舊」、毀壞文物、隨便抄家、任意打人等行為傳達了一種「肯定」的錯誤信號。隨後，江青在講話中號召造反派要「文攻武衛」，也對武鬥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致使全國各地的武鬥迅速升級<sup>17)</sup>。

據《延吉市志》、《龍井縣志》的「大事記」記載，延邊的武鬥始於1967年6月1日，「『紅色』派學生和『抗大』派學生之間發生武鬥，數人受傷。是為延邊第一起大型武鬥事件」。「6月21日，在龍井燈光球場第一次發生兩派群眾組織之間的武鬥，共打傷七十餘人，重傷10餘人」、「7月11日，『抗大』派學生四百名與紅色派『紅體兵』、『東方紅』學生發生武鬥。『東方紅』組織的一名學生在武鬥中喪生。自此，延吉市的武鬥步步升級」、「7月11日-30日，龍井鎮兩派群眾組織之間，發生大、小型武鬥幾十起，死傷數十人」、「8

月2日，在開山屯鎮，發生兩派群眾組織武裝衝突，釀成駭人聽聞的『八·二』流血事件」、「8月初，延吉縣軍管會給一派群眾組織發放步槍一千二百支，成立武裝隊，鎮壓另一派群眾組織。10月初武裝隊宣告解散」、「8月2日至16日，延吉市武鬥升級達到頂峰。毛遠新、皋峰等人以鎮壓『叛國暴亂』為由，擅自向一派群眾組織發槍，把另一派數千名群眾逼進延邊醫學院大樓（被稱為『白宮』）實行武裝鎮壓。在這一事件中有五十三人死亡，一百三十人致殘，三千餘人被俘，國家財產遭受嚴重損失」、「8月9日，在毛遠新、皋峰授意下，向全國各地散發『火、火、火！血、血、血！』（『告全國人民書』）的謠言傳單」、「8月3日-13日，一派群眾組織武裝隊，對光開公社船口大隊，實行武裝包圍，迫使當地群眾和外地來避難群眾數百人，被攆到圖們江心尾沙洲，繼而越境，製造所謂『叛國暴亂』事件」、「8月21日，紅色武裝營武裝隊進駐依蘭、開槍打死七人，汽車壓死一人，致殘數人。是為『八·二一』流血事件」<sup>18)</sup>。

由上述「大事記」可知，《延吉市志》和《龍井縣志》對延邊武鬥過程的記載過於簡略與模糊。前者對主要對立的造反派組織名稱記載混亂，比如「紅色」派和「抗大」派的組織名稱是什麼？如果說使用的是簡稱，那麼全稱是什麼？大事記中均無任何說明。後者則更省略為「一派群眾組織」與「另一派群眾組織」，自然，發生在造反派群眾組織之間的武裝衝突，於今看來，已經難以分辨對錯是非。武鬥雙方都標榜自己是忠於毛澤東思想和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因此均有資格造反并奪權。況且，即使作為造反派對立面的「保守派」<sup>19)</sup>或游離於群眾組織之外的「逍遙派」又何罪之有？據筆者考查，地方志中記載的延邊地區文革武鬥的起始與結束的日期大致是準確的，但武鬥的升級有個過程。在「延邊第一起大型武鬥事件」發生之後，各派的學生和工人造反組織等開始占據城市中的主要交通要道和制高點。如主要街道上的高樓、百貨商店等，并在一些路口設置了障礙物和防禦工事。同時，為武鬥做準備，開始土法自製武器和道具等，如石塊、彈弓、鋼盔、安全帽、棍棒、匕首、扎槍、燃燒瓶等，還有土法焊制的裝甲車。圖1就是黃永麟拍攝的群眾組織土法自製的燃燒瓶。龍井和延吉不同，基本上是在使用槍枝之前由駐軍某部支持的「紅色造反團」（或稱「紅色學生造反大軍」，以延吉縣三中「星火造反團」為主的）攻陷了對立面「聯總」（即「抗大聯合造反總部」簡稱「聯總」，由延吉縣二中的「九·一五」與「一二·二六」等造反團聯合起來的群眾組織）<sup>20)</sup>，見圖2。這

張照片拍得特別好。拍攝地點應為龍井鎮原五金商店附近。畫面左側二層樓房應為五金商店樓，為被攻擊一方的據點，其樓房頂和旁邊的平房均已被攻克方占領。被攻擊方似乎已經投降，攻擊方正在湧向據點樓，其中有帶著鋼盔和安全帽的學生、工人、圍觀者，還有頭頂著鐵桶運送食物或飲用水的女性等，為我們展現了一個剛剛停止了「戰鬥」的武鬥現場的一個歷史瞬間。



圖3 在武鬥中受傷的延吉縣第三中學學生，96頁

其次，介紹一下最後的〈破壞·傷痕〉部分。這部分共收入十四張照片。除最後三張拍的是刑場處刑的場景外，前三張為文革時期延邊地區主要負責人的照片。首頁有一段文字說明，專門介紹了毛遠新，談這位文革時期被稱為「東北太上皇」的毛遠新是如何插手延邊地區文革，成為挑動武鬥和民族矛盾、衝突等的罪魁禍首的內容，但對照片中是否有毛遠新本人，哪一位是毛遠新<sup>21)</sup>並沒有註明。另外兩張為延邊朝鮮族自治州革委會主任崔海龍和州革委會中的解放軍代表、第四十六軍軍長皋峰在大會上講話的照片。中間的八張照片均為武鬥時受傷的學生和工人的照片，圖3為其中之一。黃永麟是在怎樣一種情形下拍攝這些照片的呢？如非同一派系是很難拍到如此照片的。當時也有一些群眾組織在自製的小報上刊載一些死傷者的圖片，作為控訴對立面一派是如何殘忍、如何血腥、如何進行打砸搶的罪證而使用的。其中，自作自演以及誇大與虛假的報道并不少見。

#### 四

《延邊文化大革命·十年約定》中的〈延邊文化大革命〉這一部分共收入照片八十一枚。從1966年至1976年依次展示了延邊地區、主要是延吉縣龍井鎮文革時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等方面的情形。其中很多珍貴的照片記錄了那一時代的混亂、瘋狂、荒唐、災難、罪孽和傷痕，以及文革時期的「日常」和「非日常」的歷史。這裡對其中發生的一些較大事件和有特點的內容作一簡

要介紹。

首先，攝影集中反映了文革初期批鬥「走資派」<sup>22)</sup>的情形。圖4即為1966年8月25日延吉縣造反組織在縣內的老頭溝鎮遊鬥縣委領導的照片。這張照片是在老頭溝鎮電影院門前拍攝的，被批鬥的縣委領導在電影院擺放電影廣告牌的陽台上一字排開，每人胸前都掛著寫



圖4 在老頭溝鎮電影院的陽台上批鬥延吉縣的主要縣領導（1966年8月25日），28，29頁

著名罪名的大牌子。兩側平房應為售票處或辦公室，其房頂上也擠滿了圍觀的群眾。電影院門前的空場上站著參加批鬥會的群眾，還有坐在遊鬥卡車上負責押解的紅衛兵和造反派。被卡車載著遊鬥的縣領導共六人，其中，有延吉縣縣委第一書記崔錫麟，掛的牌子上寫的罪名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還有縣長權餘慶，罪名為「新『聯總』黑司令、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縣委副書記南興烈，罪名為「舊聯總黑司令、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副縣長朴承活，罪名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縣委財政部主任李仲來，罪名「變種狗頭軍師」、縣技術廳領導王忠海，罪名「變種反動頭頭、土匪（出身）」、縣拖拉機廠領導朴永日，罪名「變種反動頭頭」，其中除王忠海外，其他六人均為朝鮮族幹部。罪名中除了在其他批鬥會等最常見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外，還有冠以「變種」等帶有嚴重人身侮辱的蔑稱，這也算是文革中踐踏法制和人權之一例。批鬥會的形式五花八門，開著卡車遊鬥是其中之一。

其次，反映文革時期各級「革命委員會」<sup>23)</sup>成立時情形的照片不少。這部分照片有1967年11月12日延邊農學院革委會成立大會、1968年1月10日中國食品公司吉林省延吉縣公司、國營龍井飯店、延吉縣運輸公司等革委會成立；同年6月28日智新鄉革委會成立、8月18日慶祝延邊朝鮮族自治州革委會成立的遊行大會等。延邊自治州革委會成立的一組照片裡，還有新成立的革委會領導走在慶祝遊行隊伍前面的照片。其中，有第四十六軍軍長皋峰、州革委會主任崔海龍和其他「三結合」的領導成員。所謂的「三結合」是當時各級革委會領導班子的構成形式，即革委會成員中要有原幹部中的「革命幹部代表」、造反組織中的「造反派代表」和在各單位「支左」<sup>24)</sup>的解放軍代表。皋峰即為州革委會中的軍方代表。這裡還有一張照片值得介紹，即圖5。這幅照片

注明為延邊農學院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接下來的文字介紹延邊農學院是1958年8月創建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周恩來總理、朱德委員長等曾訪問過該大學。文革中該學院成為龍井鎮的颱風中心。這張照片看上去并不平靜，它是兩派學生在會場上發生肢體衝突的一個瞬間。右側的紅衛兵手握話筒，右數第三位手捂著頭的人似乎被打了，還有人要衝上去，被後面的人拉住。畫面左側的一人正向外掙脫，似乎要去尋找武器或去搬救兵。黃永麟的鏡頭抓住了這樣一個充滿了緊張和動感的瞬間，或許除了在場的當事人外誰都不會知道接下來還發生什麼。如果說，這張照片拍攝的確是延邊農學院革委會成立大會上發生的一幕，那麼，可以想見當年產生的「革委會」雖名為各派組織之間「大聯合」<sup>25)</sup>的成果，但實質上大都是一派鎮壓了另一派的產物。如今看來，無論是各派群眾組織之間的爭執與打鬥，還是互相標榜自己纔是真正的革命派、是毛澤東思想的捍衛者，其實，最後都被文革極左勢力所利用，並成了黨內高層權力鬥爭的犧牲品。

第三，文革初期林彪等人包括文革領導小組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樹立毛的絕對權威。在「三忠於、四無限」<sup>26)</sup>的口號下各地將向毛澤東表忠心作為一種宗教式的儀式。如，「早請示，晚匯報」<sup>27)</sup>等。圖6是延吉縣文化館革命委員會成立時的合影留念，也是一幅向毛主席表忠心的照片。這張照片除了文



圖5 農學院革委會成立大會（1967年11月12日）、57頁



圖6 延吉縣文化館革委會成立合影（1967年）封底頁

化館的工作人員外，可能還有下屬的文化部門以及縣裡有關部門的人、軍代表、工作人員家屬紅小兵等。前排中間的學生端著毛澤東的畫像，上面寫著毛的最新指示「革命委員會好」。照片裡的人幾乎每人胸前都佩帶著毛的像章，手拿毛語錄。還有的人胸前掛著一個用紅布縫製的心臟型的「紅心」，上面有毛的像章和「忠」字，也有的有一個像章三個「忠」字的。這種寫著「忠」字的紅心臟筆者在很多文革攝影集中均未見過，不知是否為延邊地區的「首創」？黃永麟在這張反映了文革「日常」的畫面中，為我們留下了那一時代荒唐、狂熱、愚昧的歷史見證。



圖 7 汽車前的標語牌寫著「熱烈歡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口號。龍井鎮公園體育場，82 頁

此外，還有延吉縣某中學生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龍井燈光體育場演出的情景（1967）<sup>28</sup>；有延吉縣人民檢察院「紅旗革命造反團」「擁軍宣言」（大字報形式，題目為「紅色造反者永遠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心連心」）<sup>29</sup>、批判和揭露「新『聯總』頭目罪行錄」的多幅漫畫<sup>30</sup>（解說詞有漢、朝兩種文字）、1968年1月9日在紅星小學校小學生在課堂上學習毛語錄的情景<sup>31</sup>、1969年春在龍井鎮體育場召開的歡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會的場景（見圖7）<sup>32</sup>；火車站上給知識青年送行的場面<sup>33</sup>等。1970~1976這一部分有些照片是為宣傳「赤腳醫生」下鄉、戰備軍訓、學習和宣講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知識青年在農村接受農民的「再教育」、宣傳革命樣板戲，以及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後延吉縣龍井鎮各地各單位舉行追悼活動等照片。這其中有多張照片為「擺拍」照，價值不是很大，限於篇幅不做一一介紹。

## 五

解讀《延邊文化大革命·十年約定》並非一件輕鬆之事。首先，作為讀者，也作為研究者，筆者都應感謝攝影者黃永麟，感謝他拍攝和珍藏了這麼多

地方文革的歷史影像；也應感謝韓國攝影家柳銀珪，感謝他不僅履行了一個長達十年的君子之約，而且終於使這批珍貴的文革照片得以出版問世並成為研究地方文革史的重要歷史文獻。如果沒有他們，這些照片很可能像當年其他攝影者拍攝的那些照片一樣，或被銷毀、或散佚、或不知所終地湮沒在時間的長河裡。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當年無論是延邊州、縣、市各級宣傳部門的攝影者，還是新聞報刊等的攝影記者，他們拍攝到的文革場景按理遠比作為縣文化館工作人員的黃永麟拍的多得多。然而，至今我們所能見到的反映延邊地區文革十年的攝影集也僅此一書。從文革的攝影資料來看，我們還可以列舉出楊克林編著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館》（上、下）、李振盛著《紅色新聞兵》、李遜著《文化大革命圖典》、黎生著《圖說文化大革命》和孟昭瑞著《共和國震撼瞬間》<sup>34</sup>）中的文革部分，這些都是十多年來出版的關於文革的歷史影像文獻書籍，除孟昭瑞的《共和國震撼瞬間》外，均由境外出版。其中李振盛和孟昭瑞二人為報刊攝影記者<sup>35</sup>，書中使用的照片均為原創。如果僅從原創和地方文革的歷史文獻這一角度來看，《延邊文化大革命·十年約定》的價值也不容低估。

其次，筆者想談一下在閱讀時注意到的攝影視點問題。這個問題在筆者閱讀李振盛《紅色新聞兵》時也意識到了。儘管任何一位攝影者都不可能自由自在地選擇拍攝視點，也不可能不帶有任何主觀意識來選擇拍攝的對象和記錄那些歷史瞬間，更何況在文革那樣一種複雜的嚴酷的政治運動之中。攝影者本人在文革中、特別是在文革初、中期大概難以避免地要歸屬於某一群眾組織，因而所拍攝的照片也難免會帶有那一時期某一派別的傾向性，這不僅是難免的，而且在複雜的文革環境之中也無可厚非。無論是李振盛，還是黃永麟，都只能如此。所以，在他們鏡頭的另一面也應該有不為人知的或被忽略的歷史真實。這是我們在閱讀攝影集或文革大事記中應該注意的。《延邊文化大革命·十年約定》中有一幅「武鬥」剛剛結束後的照片，見圖2。畫面之中雖沒出現被攻克方「聯總」的鏡頭，但按當時一般的武鬥處理方式來推測，被攻克方的群眾組織最後成了俘虜，不久將打著白旗或舉著雙手列隊而出。等待他們的並非《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所列舉的「不要虐待俘虜」<sup>36</sup>，相反，來自於勝利方的群眾組織的侮辱、虐待、報復或進一步追究及刑訊逼供恐怕都難以避免<sup>37</sup>。還有兩幅照片，即該書50頁和51頁上的照片均為在龍井鎮智新公社和德新公社搞的巡迴展，展題為《8·2、8·4反革命事件實錄——火！火！火！血！血！血！》。從延邊的大事記中可知這一事件，是1967年8月2日和8月4日在延

吉縣開山屯鎮發生的兩派群眾組織之間的武裝衝突，造成了「駭人聽聞」的「流血事件」，而這一事件在巡迴展中被稱為「紅色造反革命委員會」<sup>38)</sup>一派作為「反革命事件實錄」來進行宣講，很有點「勝者王侯敗者賊」的味道。在近五十年後的今天，重新來看這一事件，群眾組織之間的武鬥，衝突，顯然還難以定性為「反革命事件」，而且源於「勝者」的獨家「敘述」是否真實也是個問題。同樣的問題，也存在於文革「大事記」的敘述之中。

第三，該書的個別照片和解說有明顯的不符之處。如 55 頁應為「擁軍愛民」活動之一，照片上是給駐軍送上一封落款為「延吉縣飲食服務系統全體職工」的慰問信，而此頁的說明卻為中學紅衛兵批鬥學校校長和教導主任的內容。89 頁的照片說明為宣講如何備戰和防戰，其實是理論宣傳員在宣講無產階級專政理論<sup>39)</sup>。此外，該書附錄〈中國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文化大革命年表〉，也是目前筆者所見到的較為詳細的延邊地區文革史年表，很有文獻價值。這份年表是否出自於柳銀珪之手，主要是根據哪些文獻資料作成等，未做說明。總體來看，這份年表份量很不平衡。1966 年至 1970 年較詳，而 1971 年至 1976 年間則過於簡略，前面基本上記錄到月日；後者卻一年也只有短短的一句。另外，就是筆者注意到的如何客觀敘述的問題。近年來各地的地方志中大都設有年表或大事記，而文革十年也是一個無法繞開的歷史敘述。例如，我們回過頭來再看當年各派群眾組織之間的論爭和武鬥，很難判斷其是非對錯。如果我們也用文革時期的觀點和話語來敘述的話，不僅在客觀性上有問題，同樣也會遠離歷史的真實。

巴金先生生前曾呼籲建立「『文革』博物館」，他說：「建立『文革』博物館，這不是某一個人的事情，我們誰都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不應當只是一句空話。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記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說明二十年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sup>40)</sup>儘管巴金先生的呼籲在三十年後的今天仍然沒有得到實現，甚至連巴金先生呼籲本身也不再被主流媒體提起，但筆者還是願意相信未來，相信這個民族的文明、理性和良知終有一天會實現巴金先生的呼籲。而在那時的文革博物館裡人們一定會見到這本攝影集的。

## 注

- 1) 所謂「冷處理」是指一般在主流媒體上不採用、不發議論。如在網上帶有與「文革」相關的關鍵詞等或被處理掉，網上稱為「和諧」掉，嚴重的會被屏蔽。
- 2) 2014年5月上映的由張藝謀根據嚴歌苓的小說《陸犯焉識》改編的電影《歸來》，幾乎可以算作例外。2015年4月19日獲第3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兩岸華語電影。
- 3) 「抗日神劇」是指網絡網民的通俗說法，特指一批以抗戰題材為背景，拍攝的不尊重歷史，胡編亂造，將武俠、諜戰、偶像、言情、穿越、搞笑等娛樂性因素大量地加入劇中的電視劇，使艱難慘烈的抗戰如同兒戲，劇中的敵人大都弱智，不堪一擊，而抗日英雄大都具有蓋世神功，情節離奇，甚至出現手撕鬼子、手榴彈炸敵機等荒誕、雷人的情節，被網友吐槽為「抗日神劇」。如《抗日奇俠》（導演劉仕裕、2011）、《向著炮火前進》（導演林建中、2012）、《一個鬼子都不留》（導演王濱、2013）、《神槍》（導演李森、2012）、《箭在弦上》（導演余明生、2011）等。2013年5月16日中國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視劇管理司針對抗戰題材的電視劇中過份娛樂化現象開始著手進行整頓，那之後從整體上看，抗日神劇略有減少。
- 4) 2010年11月12日新華每日電訊報道了原北京外國語學校的紅衛兵申小珂、胡濱等八人向文革時期被批鬥、迫害的老師和校領導公開致歉的消息，題為「終於有紅衛兵道歉了」。這篇報道的副標題很有意思，題為「公開懺悔多是犯錯誤不大的人」（[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0-11/12/c\\_13603721.htm](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0-11/12/c_13603721.htm)）2013年11月《炎黃春秋》第6期刊登了一則紅衛兵道歉廣告，作者是當年的紅衛兵劉伯勤，他對當年批鬥老師和打老師以及抄家等行為表示懺悔，他道歉的動機在於無法泯滅的良知，他說：「雖有文革大環境裹挾之因，個人作惡之責，亦不可泯」。影響更大、更為廣泛的是前外交部長·元帥陳毅之子陳小魯於2013年8月20日在網上發表公開道歉信，向北京市八中文革期間被傷害的教師和領導道歉。接著，2014年1月12日文革中北師大女附中（現實驗中學）的紅衛兵代表，曾在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時給毛戴上紅衛兵袖章的宋彬彬回校參加老三屆校友與老師見面會上宣讀了致歉信。
- 5) 如網絡上有人懷疑其動機帶有商業炒作性質的，諷刺是個人作秀，甚至還有人攻擊他們的道歉和懺悔的言行是對文革的背叛。
- 6) 「紅歌」是紅色革命歌曲的簡稱，是指歌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以及社會主義制度的歌曲，自然也包括文革時期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歌曲，如《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甚至還可以包括現代京劇樣板戲的唱段和毛語錄歌。前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1949-）在2007-2012年任職期間在重慶搞「唱紅打黑」，其中「唱紅」即為大唱紅色革命歌曲，甚至組團進京，宣揚社會主義價值觀和其「唱紅打黑」的政績。媒體多有報道，影響很大。「紅歌」大概據此而廣為人知。「忠字舞」

是文革初期在大搞毛個人崇拜中誕生的歌頌毛、向毛表忠心，邊唱邊伴隨著動作的一種舞蹈，代表性歌曲為《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曾在全國範圍內推廣。

- 7) 據 2016 年 5 月 6 日中國歌劇舞劇院在官網發表的公開聲明稱「與我院的合作方虛構『中央宣傳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教育辦公室』，提供虛假材料騙取我院信任，與我院共同作為演唱會舉辦單位，於 5 月 2 日在人民大會堂演出，對於這種欺騙行為，我院將依法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詳見以下網頁 (<http://news.163.com/16/0506/23/BMDVJT4T00014PRF.html>)。同日，作為批准單位的北京市西城區文化委員會也發表聲明，「演唱會舉行時，申請方違規增加演出主辦單位，虛構『中央宣傳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教育辦公室』，對此，我們將依法依規嚴肅查處」，詳見以下網頁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0506/c1003-28331948.html>)。
- 8) 關於文革早在 1981 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已經將文革定性為「一場由領導人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 9) 2016 年 5 月 5 日一封由原勞動部長、原全國政協副主席馬文瑞之女馬曉力寫給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的公開信在網上流傳。馬曉力稱這項活動是「文革文化再現」[其演出內容中充斥著文革鏡頭、大有文革再現之感]，並指出「以這種形式紀念文革發動五十週年，完全不顧黨的政治紀律」。參見「馬曉力專訪：搞紅歌會為文革張目是在給黨中央挖坑」([聯合早報](http://www.zaobao.com/wencui/)) 2016 年 5 月 9 日，<http://www.zaobao.com/wencui/>)
- 10) 《人民日報》評論、《人民日報》法人微博、微信和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的評論均在 5 月 17 日凌晨發出，這也是一個敏感日，1966 年 5 月 16 日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俗稱「五·一六通知」)正式發表的日子。詳見人民網 (<http://bj.people.com.cn/n2/2016/0517/c233086-28346118.html>)
- 11) 馮驥才《一百個人的十年》序言〈文革進入了我們的血液〉。
- 12) 李振盛 (Li Zhensheng 1940-) 生於遼寧省大連，1960 年入吉林省長春電影學院攝影系。1963 年 8 月畢業後被分配去黑龍江省哈爾濱《黑龍江日報》當攝影記者，後任攝影組長。1964 年曾下放農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革開始前返回哈爾濱。1969 年 12 月下放到柳河五·七幹校接受「再教育」。1972 年復職，任攝影部長。1982 年調到北京國際政治學院(後更名為中國人民警官大學)新聞系任攝影教研室主任。文革期間曾拍攝近十萬張照片，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記錄。1987 年 12 月他的 20 張文革系列專題照片以《歷史告訴未來》為題在「艱巨的歷程」全國攝影公開賽中榮獲最高獎“系列新聞照片大獎”。1996 年應哈佛大學邀請赴美國訪問講學。2003 年英國菲頓出版社以英、法、德、意、西、日六種文字出版《紅色新聞兵》，該書採用圖片編年史的方式講述了作者所經歷的文革歷史。該書所選為 1964 年至 1980 年間拍攝的照片，被

評為“世界最佳攝影畫冊”，並獲美國海外記者俱樂部“最佳攝影報道獎”。日譯本《紅色新聞兵》（清宮真理譯）於2005年2月由Phaidon株式會社出版。作者現居住美國。

- 13) 柳銀珪（1962-）是韓國首爾出身的攝影家。出版有《青鶴洞—存在的夢》（韓國 WOW IMAGE, 2007）、《忘掉的痕跡 11—從照片看朝鮮族百年史》（韓國 APC KOREA 2000）、《世界的孩子們的現在—韓國編》（日本·學習研究社、2000）、《忘掉了的痕跡》（韓國圖書出版 Photo House, 1998）。從1990年至2009年舉行過多次個人展覽，如2009年在首爾舉行的《大陸的日常—中國文化大革命》等。
- 14) 引自《延邊文化大革命·十年約定》前言〈十年約定〉（日譯）。
- 15) 同上。根據日譯本〈序言〉整理。
- 16)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來自全國的紅衛兵，表達了他對紅衛兵運動的全力支持。當紅衛兵代表宋彬彬給毛戴上紅衛兵袖標時，毛問她叫什麼名字，答「宋彬彬」。毛問道：「哪個 bin？」宋答：「文質彬彬的彬」毛笑道：「要武嗎！」。幾天後《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宋彬彬將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要武」，由此全國興起了改名的高潮。
- 17) 參見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
- 18) 引自吉林省延吉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延吉市志》（北京：新華出版社，1994年12月）的「大事記」，32頁。龍井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龍井縣志》（東北朝鮮民族教育出版社，1989年8月）「大事記」，24-25頁。另外，最後一條關於所謂「『八·二一』流血事件」的記載《龍井縣志》的記載除了日期不同，為9月21日，即「『九·二一』流血事件」，整整相差一個月，還有就是《延吉市志》寫的「紅色武裝營武裝隊」，在《龍井縣志》中記為「延吉市財貿紅革會武裝隊」，死傷人數等一致。
- 19) 文革中將所謂的保守派稱為「保皇派」，含貶義。
- 20) 「聯總」是「紅色造反團」派系的對立面，武鬥後期被紅色造反團派鎮壓，後銷聲匿跡。
- 21) 據該書介紹，毛澤東的侄子、文革後期作為毛的聯絡員毛遠新1964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文革開始時帶領追隨者來到延邊，直接受文革小組江青的指揮，插手延邊地區的文革。然而，在毛遠新的後來的判決書上並沒有來延邊的事實記載，只有他在沈陽軍區第一政治部副主任的頭銜和履歷。關於他在延邊的活動只字未提。該書稱毛遠新在延邊化名「周進」，但在公開場合幾乎都沒有露面。
- 22) 全稱「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 23) 革命委員會，簡稱革委會，是文化大革命中全面奪權後，在各省市、自治區等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行政機構成立的領導機構，名稱都叫「革命委員會」一把手為主任，二把手為副主任。這種形式一直延續到文革結束後的1979年7

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議取消。

- 24) 「支左」是文革時期的用語之一，全稱應為「支持左派」，左派一般指的是造反派，即主張打倒單位被稱為「走資派」的領導的一派，而不贊成「打倒」的被稱為「保皇派」，俗稱「老保」。文革中解放軍被要求對地方實行「三支兩軍」，「三支」為「支農、支工、支左」，「支左」是其中之一。特別是文革混亂期，軍隊代表被派往各地維持秩序，但何謂「左派」，支持哪一造反派別則很難。因而，在文革中不滿軍隊的支左，群眾組織之間的衝突加劇的情況常有。
- 25) 1967年10月中央文革等發出《關於按照系統實行革命大聯合的通知》，要求社會上造反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們回到原學校和單位、部門，按系統和行業，班級實行大聯合。成立革委會的單位必須是實現了大聯合的單位或機構。但實際上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並沒有實行真正的聯合，派性之爭很嚴重。學校造反各派的爭鬥平息基本上要到1968年底，即上山下鄉之後，混亂纔開始平息。
- 26) 這是在文革初期流行的口號之一，「三忠於」即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四無限」即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要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無限忠誠。直到林彪事件出來以後纔終止。
- 27) 大體實行的時間為69至71年，每天早上在班會時間面對毛的肖像起立，手捧毛語錄向毛表忠心，有人領喊「敬祝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然後大家跟著復述同樣的內容。下班時重複同樣的內容，並匯報一天的工作成果和學習心得，思想收穫等。
- 28) 拍攝時間不詳，應為1967年。畫面上有典型的文革造反舞的造型，中間三個紅衛兵手捧大型的《毛澤東選集》（模型），後排中間一個紅衛兵將毛選模型高高舉起，環繞著手捧毛選者其餘紅衛兵做保衛狀。53頁。
- 29) 這份「擁軍宣言」為1967年10月某日（不清），見59頁。
- 30) 見60-63頁。「聯總」全稱不詳，是「新八·二七紅色造反團」的對立派的群眾組織，成立於1967年3月。文中稱其是原州委書記朱德海的保皇派，有龍井鎮內90多個群眾組織參加，後被軍管會支持的紅色造反團等在武鬥期間鎮壓。
- 31) 見66頁。文革期間，教育界成了重災區，自從1966年文革發動後正常的教學秩序被破壞，中學、大學的升學考試均被中止。武鬥等混亂時期學校基本停課，1968年中央號召「復課鬧革命」，但原有的教科書不能使用，只能用毛語錄作教材。1970年各省的試用教材開始陸續出版。畫面上的「紅星小學」應為文革初期改的名稱，原校名待查。
- 32) 毛澤東在1968年12月22日發表「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之後當年在校的初中以上學生同時畢業，「上山下鄉」，到農村去插隊落戶。該項政策實行了近十年，1978年10月中央決定停止上山下鄉運動，允許已下鄉的「知青」回城就業。

- 33) 見 83 頁。
- 34) 楊克林編著《文化大革命博物館》(上·下)(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新大陸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初版,2004年再版)、李遜著《文化大革命圖典》(香港:日月出版公司、2006年6月第三版)、黎生著《圖說文化大革命》(香港:全力圖書有限公司、2006年6月)、孟昭瑞著《共和國震撼瞬間》(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7月),最後一本其中收入了很多文革時期的原創照片,故將其歸納在一起討論。
- 35) 孟昭瑞(1930-2014)、著名攝影家,1948年後先後在人民解放軍華北畫報、解放軍畫報社做攝影記者。著有《歷史的瞬間》、《東方紅:開國大典的歷史瞬間》、《共和國震撼瞬間》等。
- 36)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紅軍在1929年創建時制定的,後來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逐步完善,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起草《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於重新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後又譜成歌曲傳唱。其中「八項注意中」中有一條「不虐待俘虜」。
- 37) 《龍井縣志》〈大事記〉中有一段寫到1967年8月「一派群眾組織的武裝隊到縣內各地,非法搜捕另一派群眾組織的頭頭數十人,並關押在縣政府地下室,搞刑訊逼供,製造『地下室事件』」。這裡並沒有寫「地下室事件」為何事件,其結果如何?但可以推測,這裡寫的「非法搜捕」和「搞刑訊逼供」就是武鬥鎮壓了對立派後所搞的報復行為。
- 38) 該書注為「紅色造反革命委員會」(或稱「紅色造反大軍」)和「工人革命委員會」,由於從日語譯文再譯,可能和原稱不符,待查。
- 39) 原照片說明為「1975年8月25日民兵(中間梳小辮的女性)在指導村民一旦發生戰爭如何對應」,這是不確的,照片的上方牆上貼了張紙,寫著「廣播理論講座內容」,其中依次為:一,關於小生產問題;二,關於資產階級法權;三,批判水滸;四,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其實就是中間女性宣講的內容。
- 40) 該文作於1986年6月15日,後收入《隨想錄》第5卷《無題集》,轉引自楊克林編著《文化大革命博物館》(上)。
- (本論文使用照片均引自《延邊文化大革命·十年約定》一書,版權歸該書所有,特此聲明)